



高校学术文库

汉译国外普通语言学 典籍研究 (1906—1949)

Explor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General
Linguistic Classics: 1906—1949

贾洪伟 著

Jia Hongwei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汉译国外普通语言词典籍研究 (1906—1949)

Explor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General
Linguistic Classics: 1906-1949

贾洪伟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译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研究=Explor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General Linguistic Classics:1906-1949/贾洪伟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656-3592-2

I. ①汉… II. ①贾… III. ①普通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4737 号

HANYI GUOWAI PUTONG YUYANXUE DIANJI YANJIU (1906—1949)
汉译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研究 (1906—1949)

贾洪伟 著

责任编辑 孙少红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http://cnupn.cnu.edu.cn>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85 千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代序一

中国没有开创科学的语言学，却为科学的语言学做出重大贡献，因为中国有相当发达的语文学，即前语言学。严格来说，语文学与语言学没有截然的界限，没有语文学就没有语言学，两门学科只是传承关系。所以要分开来说，在语言学上加上“科学”两字，并不代表语文学是不“科学”的，只是说明语言学使用了现代科学的成果，在理论和方法上更符合现代科学的范畴。语言进入现代科学的范畴是从历史语言学开始的，历史语言学就是建立在语文学基础上的，没有语文学的历史研究，就无法建立科学的历史语言学。中国的历史语言学如果离开了中国传统语文学中的文字、音韵和训诂等学问，必定寸步难行。中国音韵学中的声、韵、调分析法，至今是中国历史语言学，甚至现代语音学分析的一个基本概念和方法，中国语文学的成果如韵书和韵图至今是中国历史语言学比较不可或缺的资料。现代语音学引以为荣的音位概念和互补原则，在语文学中早就使用，否则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为什么大多是音位文字而不是音素文字就无法解释。语文学只是限于时代的局限性没有总结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 20 世纪初“西学东渐”的热潮中，语言学也不例外，一些著名的学者从国外引进现代语言学，并用来研究中国的语言。那时的引进是兼容并包，不分学派，百花齐放，应该是与世界同步的。1949 年以后，情况大变，独尊苏联，全面关闭了引进西方语言学的通道。当时的苏联脱离了俄国语言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在政治高压下形成了一种只能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从事语言研究的思潮。中国引进了这种研究思潮，以哲学的理论基础代替了学科的基础理论，形成一花独放，与苏联自成一派，远离了世界语言学发展的道路和共同进步的方向将近半个世纪。直至 20

HANY GUOWAI PUTONG YUYANXUE DIANJI YANJIU

汉译国外普通语文学典籍

研究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时期,语言学才重新回到与世界接轨的正确方向,不仅引进科学的理论、先进的科技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解放了思想,激发了创造的力量。回顾这段令人深思的曲折历史,自有发人深省的地方。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所谓“兴替”就是温故知新,即回顾可以了解渊源开阔眼界,正视缘由深入现实,发现变化预测未来。原来在语言学界不太受关注的语言学史研究,像其他社会科学拨乱反正一样,“史”的研究重新受到关注。洪伟因时得势,顺应潮流,写出《汉译国外普通语文学典籍研究(1906—1949)》一书,意在推动语言学史研究,开辟新研究领域,构建新研究框架,贯通古今,融合中外,使语言学史的研究有所发见、有所推进、有所创造,是适应语言学研究和社会实践需要的一件值得花费精力来做的好事。

通读书稿,觉得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时段选择在中国引进现代语言学萌芽期的半个世纪。这个时期是中国语言学筚路蓝缕的开创阶段,政治尚未统制学术,思想自由,视野宽阔,引进和译介者大多属于大师级人物和著名学者,他们大多博通古今,兼涉中外,引进和译介的典籍以及各自的著作,意义深远,流传至今。特别是这段历史所受关注不够,论述较少,值得进一步探究和介绍。

第二,作者构建了一个新的“述史”框架:以史带论,以论及人,沟通古今,论法结合,述议互照。作者不仅讲史,探讨中国语言学的发生和发展,而且全面介绍、评价和深入分析汉译典籍和有关著述的内容和方法,特别是详细介绍了译介者和著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成就,使读者能通过这些译著和作者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些典籍和著作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第三,作者精通外语,在论史的过程中,便有了形实结合的新视角,即不仅探讨和研究史实,论述典籍的内容和方法;而且兼及译介形式和方法,比如术语和版式的流变和发展。这实际上已涉及学术和术语的规范及其历史,是前人在史论中很少关注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一个学科的发展,范畴的建立,分类的确

定，术语的发展和规范是一个重大问题，作者以丰富的资料和深入的探讨为史论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第四，作者着意介绍和研究了这些萌芽期引进的典籍和著作对语言学不同学科和门类的深远影响。包括语音、语义、结构、形态和类型等有关语言各种要素涉及的问题，以及历史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语言学的各种学科。读者通过这些介绍和研究可以深入地了解中国语言学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国外语言学之间的渊源关系。附录中特别提供了《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历史反思》一文，总结了中国语言学经历的曲折道路和经验教训，是一份值得一读的好资料。

这部著作虽然只是一部断代的语言学史，所述时间不长，却又像是一部学科史和学术史，除了给读者一种历史感受，同时也能激发读者对语言学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认识学科发展的过程和影响。希望这部著作的出版能在诸多语言学史的作品中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或许是作者的初衷，也是我们的期望。特此为序。

瞿福忠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15年10月

代序二

语言研究，古今中外均有之。关于词物对应关系，古希腊学者立足语言符号的意义与形式、使用与起源，提出“本质论”与“约定论”，形成了“规则论”与“不规则论”二元对立的语言研究传统。前者认为，词是由事物本质命名，二者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词与物常常是“一对一”的关系，如同一棵树在水中有个倒影，树是本质，树影则是树的体现；后者认为，词是由使用者规定或因习惯约定俗成的，二者任意地、不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词与物常常是“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关系。前者被称作“本质论”或“规则论”，后者被称为“约定论”或“不规则论”^①。

周秦诸子立足词语命名和语言使用提出“名实”“正名”“约定俗成”等学说。老子“名可名，非常名”主论命名及名实关系，实则涉及语义指称问题；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主论政务与名实关系，实则涉及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问题；荀子“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及“勿以奇辞以乱正名”，主论名实对应关系和语言使用问题，实则涉及词物对应的关系问题及语言文字规范性使用的问题。此类思想散见于古代诸家文献，如《庄子·逍遥游》《尹文子·大道上》《公孙龙子·名实论》《公孙龙子·

^① 见王远新：《语义学学科史研究的新进展——〈国外语义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序》，1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指物论》《墨子·经说》《荀子·正名篇》等^①。先秦诸子关于语言与意义、名与实的理论探讨，虽未发展成独立的系统的语言研究范式，但各派着眼辨识名实关系以求把握语言性质，自足诠释名实关系以求理解语言内容的研究思路，对后世语言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汉扬雄历经艰险撰毕《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收集材料的方法就是现代社会语言学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②。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分析小篆的内部结构，开创“据形系联”的部首归类法，揭示了汉字内部结构的系统性，为后人沟通传统训诂学的意义推求与建立新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相关问题的关系阐释奠定了学理基础。

中国语言研究由传统小学走向学科化，自有学科发展的内部需求和外部促进因素，但不能忽略国外语言学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关于国外语言学的入华时间，不同文献说法不一，大致有依据印度胜论说、《马氏文通》语法说、章太炎立学科名目说、胡以鲁写作本土语言学著作说等观点。

中国传统语言研究历史久远，但现代语言学单列为学科必然关涉到章太炎于1906年在日本《国粹学报》第24至25期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将语言研究命名为“语言文字学”这一史实。有关章氏之后至1949年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断代史问题，虽见诸中国语言学史类的著述，但大都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充分性。具体而言，中国现代语义学史、国外语言学的中国化、中国传统语言学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比较研究、中国传统语言学治学方法与中国现代语言学治学方法的比较、中国现代语言学概念和术语的衍化等主题的史学研究，均有待深化和系统化。譬如，中国普通语言学的发端问题、中国现代语义学的发端问题、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句法发端问题、国外语言学的传播路径、国外语言学的影

① 见王远新：《古代语言学简史》，13—20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见贾洪伟：《田野调查与语言研究考察——兼述〈语言田野调查实录〉》，载《语言与翻译》，10—12页，2013年第3期。

响程度、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阶段性特征、语言学术语的更替与规范化问题、影响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学科史的启示意义等，均需条分缕析，深入探讨。

已有的中国语言学史类著述，或多或少涉及1906—1949年间中国普通语言学断代史问题，如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邵敬敏等《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刘坚《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盛林等《二十世纪中国的语言学》（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等，对该期内容均有所涉及，但从总体来看，用力均有所不足，不是文献不全面，不能完全地呈现该期发展脉络；就是分期差异较大，未能细致、系统地呈现国外语言学在该期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重大变革、重要思想、重要术语更替及其影响和启示意义。

令人欣慰的是，《汉译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研究（1906—1949）》（原为作者博士论文《西方普通语言学典籍汉译（1906—1949）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2011）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过程中，作者积累了大量语言学原始文献，且通过博士和博士后阶段的积累，掌握了学科史学的研究套路和写作规范，经过几年的增删与修改得以完成这部断代史著作。

作者秉承“史—论—法”有效结合的史学精神，以1906—1949年近半个世纪来国外语言学汉译典籍为对象，以国外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历程，细致分析语言学重要术语的衍化，准确界定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汉译的学科史地位，反思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启示，彰显了“述往事、思来者、明道理”的史学精神。

这部著作选题较好，构思严谨，材料丰富，史料翔实，分析

得当，史实与文本分析相互连通。书末所附《论苏联语言学汉译历史分期（附苏联普通语言学典籍汉译大事记）》《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历史反思》《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译介大事记（1906—1949）》等，不但能有效地与该书正文建立互动关系，联系1949年后中国现代语言学和语义学的发展动向，还能有效地说明社会文化氛围与学科发展的关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之，《汉译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研究（1906—1949）》是一部有分量的语言学断代史、学科译介史著作，我作为作者的博士后合作研究导师，乐为之序。

王远新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2015年12月30日

前 言

20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引进国外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时期。虽然国内不少著作(特别是语言学史方面的著作)对这一重要时期有所涉及,但大多都不够详细,所涉及的文献也不是很全面,且以译介为着眼点,以译介文本为分析依据,并以此来展开论述和分析的著述就更为少见。

基于这种状况,本书以 1906—1949 年间中国引进国外普通语言学^①的著述为分析依据,以引进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的方法和途径为切入点,系统梳理该段时期中国译介国外语言学思想的历史,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国人以何种方式引进了哪些理论,对中国现代语言学起了怎样的影响,对今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和语言教学有怎样的启示,如何在引进、模仿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廓清中外语言学之间的承袭关系,为中国语言学史的探索提供必要的补充。

本书第一章回顾 1906—1949 年间汉译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界定译介的定义与研究范围,阐述选题目标与意义、研究问题与范围等;第二章梳理该期汉译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研究的历史,根据传入路径、时间和译介方式等标准分期,总结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著作及其特征;第三章集中分析该期的译介文本,归纳该期引进的术语,考察该期语言学术语的流变,总结该期中国语言学典籍译介的过程走向以及该时期中国语言学典籍印刷版式的流变;第四章从语言学本体(语音、结构、

^① 本书之所以使用“国外语言学”而非“西方语言学”,其一是因为“西方语言学”本就是模糊所指,比较难于界定“印度胜论说”的归属问题;其二是因为“西方语言学”无法包括日本语言学、通过日本引进的苏联语言学以及从苏联直接传过来的苏联语言学。因而,若非引用,或已说明的特殊原因,本书一概以“国外语言学”统辖之。

形态与类型、意义等)和语言学分支学科(历史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两个层面,归纳该时期国外语言学典籍汉译对中国现代语言学本体各部门及其分支学科所产生的影响;第五章梳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治学方法和特点,介绍现代语言学治学方法的引进,论述中国传统语言学治学方法与现代语言学治学方法的差异,阐述引进现代语言学治学方法的意义;第六章总结该时期汉译国外语言学典籍的历史成因、影响该期语言学典籍汉译的因素、语言学典籍译介的作用、语言学典籍译介对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影响和本书的研究发现,归纳该期语言学典籍汉译的启示以及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书创新点有四:

第一,以国外语言学典籍汉译的方式和途径为分析依据,梳理该期中国译介国外现代语言学思想的成果,划分国外现代语言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归纳重要人物、作品及其该期的主要特征,是同类研究中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第一部断代史和语言学译介史著作。

第二,从译介方式入手,以文本分析为依据,采用考证和比较分析法探明国外语言学思想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同时还追溯不同文本之间的关联,还原该期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原貌,为叙述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提供佐证。

第三,梳理该期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重要概念、术语及其演变的脉络及其对中国现代语言学产生的影响,同时归纳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与中国传统语言学治学方法间的差异。

第四,对该期汉译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研究给予学科史的定位与评价,反思该段历史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启示:语言学研究须重视模仿与创新间的平衡,注意引进的新理论对现有语言研究的推动作用,重视不同语言间的参照比对,期望能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和语言学译介史研究提供借鉴和启迪。

本书发现有六:

第一,通过文本阅读,确立了西方普通语言学思想传入中国

的具体时段，且每个著作译者的关注点不同，各部著作之间没有紧密的关联，在语料的取舍方面尺度各异，即：这些著作所用的外文语料不够全面，甚至根本缺少相应的语料，而且理论上的独立思考也不够充分。

第二，20世纪30年代以前与30年代以后的语言学著述在印刷版式方面差异较大。

第三，1949年前中国已经引进外国有关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言学史、语言与思维等研究的思想，且已经开始相关的研究和实践。

第四，在这个时间范围内，中国引进的语言学典籍，有的在本国地位并不高，影响也不大，其引进完全是受到当时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如有关国际语和世界语的著述。

第五，该期的语言学典籍，模仿和译介多于对比和创新，其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新研究和国外语言学新理论的引进，须做好对比、模仿和创新间的平衡。

第六，中国现代语言学并非是西方现代语言学的舶来品，而是中国传统语文学研究与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作为一部以1906—1949年间国外普通语言学译介文本为分析主题的专著，本书尚未穷尽此期所有文献，且就现有分析而言，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现有的不足留待以后撰文阐述。因作者才疏学浅，书中肯定有不当和错漏之处，希望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选题目标与意义	(1)
二、研究问题与范围	(2)
三、历史与现状综述	(3)
四、语言学典籍译介史研究的特点	(11)
五、语言学典籍译介史研究的方法	(14)
六、译介的概念界定	(16)
七、本书结构	(47)
第二章 语言学典籍译介研究概述与分期	(48)
一、典籍译介的历史综述	(48)
二、历史分期	(54)
三、本章小结	(61)
第三章 20 世纪上半叶普通语言学典籍译介文本分析	(62)
一、译述文本分析	(62)
二、编译文本分析	(88)
三、直译文本分析	(120)
四、转译文本分析	(141)
五、特殊文本分析	(154)
六、术语引进	(164)
七、语言学术语的流变	(165)
八、译介的过程走向	(195)
九、写作出版规范的演变	(196)



十、本章小结	(198)
第四章 典籍译介对中国现代语言学本体及其分支的影响	(199)
一、语言学本体	(199)
二、语言学分支学科	(209)
三、本章小结	(224)
第五章 典籍译介对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226)
一、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	(226)
二、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译介	(233)
三、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与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差异	(235)
四、引进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237)
五、本章小结	(238)
第六章 余 论	(239)
一、20 世纪上半叶国外语言学典籍汉译的历史成因	(239)
二、影响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译介国外语言学典籍的因素	(242)
三、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译介国外语言学典籍的作用	(244)
四、语言学典籍译介对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影响	(245)
五、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译介国外语言学典籍的启示	(246)
六、研究发现	(248)
七、不足与展望	(249)
附录 1 论苏联语言学汉译历史分期	(251)
附录 2 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历史反思	(271)
附录 3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译介国外语言学典籍分布表	(283)
附录 4 20 世纪上半叶语言学典籍译介者信息	(285)

附录5 语言类型划分术语译介表	(287)
附录6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法研究方法演变表	(288)
附录7 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译介大事记(1906—1949) ...	(289)
参考文献	(300)
参考文本	(306)
后记	(319)

第一章 绪 论

一、选题目标与意义

迄今为止，本书探讨的话题——语言学典籍译介史（1906—1949），在史籍之中，只有马祖毅主编的《中国翻译通史·现当代部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及邵敬敏与方经民合著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史》（1991）稍有涉猎。

目前，国内外对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给予通史性研究的，只有德国学者海恩瑞奇（Patrick Heinrich，出生日期不详）的《西方语言学在日本的接受》（*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Linguistics in Japan*，2002）和中国姚小平教授在台湾辅仁大学的讲座记录文稿《中国语言学典籍汉译史》（2007）。而对语言学典籍译介史的阶段性研究，即断代史研究，尚未发现。

本书对自1906年章太炎提出“语言文字学”到1949年的语言学典籍的译介给予断代史研究，拟从横、纵两个层面全面地考察1906—1949年间中国语言学典籍的译介状况，旨在挖掘当时国人学者的译介动向、译介方法的使用、术语的演变与更替、语言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流变，揭示中国语言学在萌芽时期发展的轨迹、特点、成就及其对中国语言学所产生的影响。最终，中国普通语言学思想与国外普通语言学思想的源流关系得以清晰地呈现。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有四：（1）有助于了解当时国人以何种方式，引进了哪些语言学理论，对中国现代语言学产生怎样的影响？（2）有助于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译介国外语言学典籍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和语言教学的开展具有怎样的启示？（3）今日中